



浙大学术精品文丛

工资、就业与劳动供给

◎ 郭继强 著



商務印書館

浙大学术精品文丛

工资、就业与劳动供给

——对中国农民工低收入处境的理论分析

郭继强 著

商务印书馆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工资、就业与劳动供给/郭继强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浙大学术精品文丛)

ISBN 978-7-100-05873-5

I. 工… II. 郭… III. 劳动工资管理 IV. F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 第 07651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工资、就业与劳动供给

——对中国农民工低收入处境的理论分析

郭继强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873-5

2008年7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0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印数 5 000 册

定价: 22.00 元

《浙大学术精品文丛》总序

近代以降，西学东渐，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成为开明人士的共识。杭州知府林启(1839—1900)会同浙江巡抚和地方士绅，积极筹备开设一所以西方科学体系为主要课程的新型学堂。经清廷批复，求是书院于1897年3月在杭州设立(1901年改为浙江大学堂)。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几所新型高等学府之一。

求是书院几经变迁，到1928年，成为国立浙江大学。1936年，杰出的气象学家和教育家竺可桢(1890—1974)出任校长，广揽英才，锐意改革，很快使浙江大学实力大增，名满东南。抗日战争期间，全校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艰苦跋涉，举校西迁，在贵州遵义、湄潭办学，一时名师云集，被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浙江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名家辈出。1928年，浙大正式设立文理学院，开设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哲学、心理学、史学与政治学等学科。1936年增设史地学系，1939年，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理学院，1945年成立法学院，后又陆续增加哲学系、人类学系、经济学系等系科和一批文科类研究所。与求是书院同年创建的杭州育英书院，1914年成为之江大学。陈独秀、蔡元培、陈望道、胡适、蒋梦麟、马叙伦、马一浮、郁达夫、夏衍、吴晗、胡乔木、施蛰存、郭绍虞、林汉达、经亨颐、汤用彤、谭其骧、劳乃

宣、邵裴子、宋恕、蒋方震、许寿裳、沈尹默、邵飘萍、梅光迪、钱穆、马寅初、张荫麟、张其昀、贺昌群、钱基博、张相、夏承焘、姜亮夫、朱生豪、王季思、严群、许国璋、王佐良、薄冰、方重、裘克安、戚叔含、李浩培、孟宪承、郑晓沧等著名学者曾在这两所学校学习或任教。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浙江大学一度变为以工科为主的高等学府。它的文学院和理学院的一部分,与之江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合并成为浙江师范学院,后演变为杭州大学。它的农学院和医学院则分别发展为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1998年9月,同根同源的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成为新的浙江大学,这是新时期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新浙大是目前国内学科门类最齐全、规模最大的研究型综合性大学之一。

新浙江大学成立后,人文社会科学得到了更大、更好的发展机遇。目前,浙江大学拥有文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学、艺术学、教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全部一级学科,门类齐全,实力雄厚。而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学科交叉和相互渗透方面,浙江大学更具有明显优势。为了有力推动浙江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世纪之初,学校确立了“强所、精品、名师”的文科发展战略,从机构、成果、队伍三方面加强建设,齐头并进。《浙大学术精品文丛》就是这一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构成了人类的知识系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历史与未来,社会与人生,中国与世界,旧学与新知,继承与创新……时代前进和社会发展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趋势

下,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和重要性正日益凸现,每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必将以独立的思考,来回应社会、时代提出的问题。编辑这套《浙大学术精品文丛》,正是为了记录探索的轨迹,采撷思想的花朵。

浙江素称文化之邦,人文荟萃,学脉绵长。自东汉以来,先后出现过王充、王羲之、沈括、陈亮、叶适、王守仁、黄宗羲、章学诚、龚自珍、章太炎、鲁迅等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南宋后更形成了“浙江学派”,具有富于批判精神、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鲜明学术传统。浙江大学得地灵人杰之利,在百年发展史上集聚和培育了大量优秀人才,也形成了自己“求是创新”的优良学风。《浙大学术精品文丛》将以探索真理、关注社会历史人生为宗旨,继承优良传统,倡导开拓创新的精神,力求新知趋邃密,旧学转深沉。既推崇具有前瞻性的理论创新之作,也欢迎沉潜精严的专题研究著作,鼓励不同领域、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共生共存,融会交叉,以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浙大学术精品文丛》是一套开放式的丛书,主要收纳浙江大学学者独立或为主撰写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著作。为了反映浙大优良的学术传统,做好学术积累,本丛书出版之初将适当收入一些早年出版、在学界已有定评的优秀著作,但更多的位置将留给研究新著。为保证学术质量,凡收入本丛书者,都经过校内外同行专家的匿名评审。“精品”是我们倡导的方针和努力的目标,是否名实相符,真诚期待学界的检阅和评判。

同样诞生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向以文化积累和学术建设为己任,盛期曾步入世界出版业的前列,而今仍是在海内外享的盛誉的学术出版重镇。浙江大学和商务印书馆的合作有着悠久的历史。

史。早在 1934 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过《国立浙江大学丛书》。值得一提的是,浙大历史上有两位重要人物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一是高梦旦(1870—1936),他 1901 年任刚刚更名的浙江大学堂总教习,次年以留学监督身份率留学生赴日本考察学习。1903 年冬他应张元济之邀到商务,与商务共命运达三十余年,曾任编译所国文部部长、编译所所长,主持编写《最新教科书》,倡议成立辞典部,创意编纂《新词典》和《辞源》,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老校长竺可桢,他 1925—1926 年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史地部主持工作,参加了百科词典的编写。在浙江大学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今天,百年浙大和百年商务二度携手,再续前缘,合作出版《浙大学术精品文丛》,集中展示浙大学人的研究成果。薪火相继,学林重光,愿这套“文丛”伴随新世纪的脚步,不断迈向新的高度!

目 录

1. 导 论	1
1.1 问题的领悟	1
1.2 本书的研究思路及其方法	14
1.3 以理论探索为主旨的章节安排	19
2. 低收入者工资与就业研究的理论脉络	24
2.1 最低必需支出的理论考察	25
2.2 对低工资中存在向下倾斜劳动供给曲线的理解	47
2.3 既有工资和就业理论留下的若干研究空间	60
3. 低收入者劳动供给曲线	64
3.1 经典劳动供给曲线的条件约束	64
3.2 最低必需支出约束下的拐点分析	68
3.3 关于低收入者劳动供给曲线的刷新式理解	70
3.4 对经典劳动供给曲线“例外”情况的再认识	79
附录:低收入者劳动供给曲线的推导	85
4. 劳动供给的经验或实证分析	93
4.1 上海农民工的劳动供给	94
4.2 中国城市居民的劳动供给	102

4.3 关于中国劳动供给行为的一般理论概括	109
5. 中国农民工的低工资现象	115
5.1 经典劳动供求理论果真能解释农民工的低工资 现象吗	115
5.2 最低必需支出约束下的劳动供求	123
5.3 农民工劳动供求与保留工资陷阱	127
6. 对若干工资决定著名理论的重新认识	146
6.1 若干工资决定著名模型的历史背景和 理论承接	146
6.2 低收入者工资决定模型	156
6.3 寻求对若干著名工资决定模型的统一理解	161
6.4 低收入者工资与就业决定的相关性	172
7. 工资可伸缩性条件下的失业	175
7.1 工资伸缩性与失业问题	175
7.2 基于劳动供给拐点的就业决定模型	180
7.3 理论实证与现实分析	191
7.4 中国就业政策的理论回顾	196
8. 马克思工资及失业理论的现代经济学理解	205
8.1 问题的引出	205
8.2 基于向下倾斜劳动供给曲线的工资和就业决定 模型	209
8.3 对马克思有关工资和失业论述的现代经济学 解读	213
8.4 分析结论及其启示	223

9. 中国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城乡双锁定	230
9.1 乡城人口流动的经典理论概览	231
9.2 农民工城乡工资耦合中的双锁定工资模型	234
9.3 农民工城乡双锁定工资的现实分析	241
9.4 “民工荒”与保留工资抬升	252
9.5 关于刘易斯模型的几点评论	257
10. 结论与展望	262
10.1 结论与启示	262
10.2 问题与展望	286
参考文献	289
后记	326

1. 导 论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的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爱因斯坦^①

1.1 问题的领悟

经济学几百年以来的发展,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是围绕着以“工资、就业与劳动供给”为核心的分配理论这条主线展开的,这条主线曾困惑并激励着经济学家在诸多研究领域做出一系列创新。工资、就业和劳动问题,可谓是经济学说史的一个重要的侧面。以成本价格为中心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偏重于对劳动工资及其决定的研究,其价值理论的内核是寻求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内在一致的收入分配制度。但以构筑工资合理决定的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都没有刻画出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曲线,这或许与当时经济学的研究注重于定性分析有关。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卡尔·门

^① 爱因斯坦、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周肇威译,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66 页。此外,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也出版过该著作。

格尔、欧根·冯·庞巴维克、里昂·瓦尔拉斯等人将边际分析引入了经济研究,他们注重消费者行为及其需求对工资或劳动价格形成的影响,可这种将研究视野从生产、供给和成本扩展到消费、需求和效用的分析,也没有描绘出与这些分析相对应的劳动供给和需求曲线。对工资、就业与劳动供给的考察所留下的这一不足,是由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马歇尔来弥补完成的。马歇尔将商品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均衡映射于劳动的供给和需求,于是,在经济学世界中出现了劳动的供给和需求曲线,他认为工资和就业的决定是由劳动供给和需求同时或共同引致的。这个“同时决定”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分配对行为激励和资源配置的影响,折射出经济主体的行为、绩效与收入之间的内在关联。不过,由于当时西方各国的劳动分工、生产专业化和技术进步的各种规定性,决定了包括马歇尔在内的经济学家不可能全方位地深究劳动供给曲线的各种走势,劳动供给曲线在经济学家观念中一般是向右上方向倾斜的。至于向右上方向倾斜之劳动供给曲线的逻辑基础,则是由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典劳动供给模型(The Canonical Labor Supply Model)揭示的。嗣后,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背景下,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自动出清,“凯恩斯革命”指出了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存在,认为有效需求决定就业水平和收入水平。

到了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劳动供给曲线的其他走势。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依据现实中的劳动供给,曾将劳动供给曲线描述成水平状态,但他并没有对劳动供给曲线为何呈水平状做出有力的解释;拉尼斯和费在肯定刘易斯核心观点的基础上,对劳动供给做出了结合工农业发展的说明。经济学针对劳动供给曲线走势的考察和分析,有没有给我们留下进一步研究的空

间呢?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经济状态的国家,其劳动供给曲线是否完全由向右上方倾斜或水平状这两种态势所涵盖呢?中国的情况既不同于历史上的西方,也不同于现实中的西方,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以中国低收入者的工资和就业为分析对象,其劳动供给曲线是不是可以根据具体国情展开拓宽性研究呢?本书的选题及研究对象的框定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对劳动供求的分析,通常基于“向右上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与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相均衡”的经典理论框架。可是,作为向右上方倾斜劳动供给曲线之逻辑基础的经典劳动供给模型,却隐含着“劳动者的支出可以是不超过收入的任意水平”的假设。在笔者看来,劳动者的支出固然与其收入密切相关,但支出并非仅是收入的衍生物,它有自身的规定性,譬如劳动者存在着最低必需支出约束(此概念是本书重点分析的一个范畴,它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本书的研究主旨)。实践表明,中国的低收入阶层的劳动供给与最低必需支出约束相关,中国企业的劳动需求也同最低必需支出约束有关。正是最低必需支出约束的存在,改变了劳动供给曲线的走势。

在现实的层面上,经济学家与普通人对经济生活中某一侧面的感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都是在宽泛意义上使用“低收入者”概念,尽管他们对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低收入者既可指整体人群中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那部分人,也可按是否受制于最低必需支出约束来划分。对发达国家来说,这两种不同低收入者的划分所产生的低收入者人群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处于低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处于工业化初期的

国家来说,不同划分标准所产生的低收入者人群却有较高的重合度。对中国低收入者的界定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能否从最低必需支出制约来分析这个问题,无疑对理论的创新和政策的制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书试图从最低必需支出约束来研究低收入者的思路,使得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划归于“穷人经济学”的领地。关于穷人经济学的英文表述,目前学术界有两种不同解读:一种是沿袭西尼尔(N. W. Senior)的提法,即“Economics of the Poor”,这里的“the Poor”就是指“穷人”;另一种则是承接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T. W. Schultz)在其获奖演讲中的提法,即“The Economics of Being Poor”,其中,“Being Poor”是指“贫穷”或“贫穷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社会、国家或经济体^①。舒尔茨之所以要提出“The Economics of Being Poor”,是认为“经济学家发现,要想理解使穷人做出自己的选择之有关偏好和稀缺方面的约束因素,十分困难”。这一困难体现何处呢?显然,他给后续研究者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破译舒尔茨这一提法的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曾做出过努力。韩朝华(2005)认为,准确的译法应是“关于贫穷的经济学”或者“贫穷中的经济学”。他还强调,进行这样的语义辨析不是无事生非,无关紧要。因为谈论“穷人的经济学”,针对的是社会中的一部分成

^① 舒尔茨1979年12月8日在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讲,就是以“The Economics of Being Poor”为题。王宏昌和林少宫编译的中译本,将其译为“穷人经济学”(载于王宏昌、林少宫编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69—1986)》(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3—434页)。以这一演讲稿为基础,舒尔茨还在《人力资本——人口质量经济学》中发表了同名的文章,吴珠华将其译为“穷国的经济学”(载于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40—53页)。

员,且关注的重点在于财富的分配和社会公平;而谈论“穷国”、“穷社会”或“穷经济体”的经济学,针对的则是整个社会,其关注的重点是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增长。它们分属于经济学中两个不同的领域和范畴。贫穷经济学因关注社会整体的脱贫和发展,更多地被归入了发展经济学的范畴。显而易见,韩朝华的这种区分有其合理性和可取之处,但本书的分析则是要贯穿或者说兼容这两种理解取向,尤其是对现阶段中国的“三农”问题,更应如此。关注低收入者工资和就业的决定问题,既是关注低收入者的民生,又是在此视角下探讨宏观经济运行机理以及经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实际上,关注低收入者的民生,是人类追求社会和谐、实现共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本书之所以提及“穷人经济学”,主要是为了强调本书所考察的低收入者受到最低必需支出的束缚。而且,这并不妨碍笔者反对把现代主流经济学看作是“富人经济学”而与“穷人经济学”相对立。主流经济学作为分析和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一套方法和工具,并没有限制研究对象必须是穷人还是富人。诚然,主流经济学起源于英、美等发达国家,它对富国面临的问题关注更多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人,现实则要求我们更多地聚焦于不发达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应用于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本书的研究将表明,引入最低必需支出的约束条件,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或者说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仍然能够探究低收入者的工资和就业决定问题,并为散落在古典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之中的低收入者工资决定机制提供一个统一理解的新视域;同时,我们还对主流经济学迄今尚未深究的、在工资伸缩性条件下可能出现

的失业问题进行开拓性研究。

就本书直面的现象或问题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看似互不关联的五个方面:

1. 现阶段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的低工资现象。

在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巨大的人口基数、严峻的“三农”问题以及现行的制度安排,共同推动着农民工(或简称为民工)队伍的快速膨胀^①。目前中国至少有 9400 万农民工在城市就业^②,还有 1.5 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继续涌向城市。然而,大部分农民工受自身文化素质、城市就业体制和城市发展对劳动

①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指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广义的农民工,既包括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也包括在县域内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参见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 页)。

② 关于中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经常被引用的是农业部的统计数据,2002 年为 9400 万,2003 年为 9800 万。更为权威的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在所著《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中指出:“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有多少?以 2004 年为例,国家统计局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对 6.8 万个农村住户和 7100 多个行政村抽样调查,推算出当年外出就业农民工约为 1.18 亿人,占农村劳动力的 23.8%。农业部根据对 1 万个农户的跟踪调查,推算出外出农民工约为 1 亿人,占农村劳动力的 21%。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根据对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不含县级市和县城)流入农民工的统计,推算出农民工约为 9000 万人。经过对上述三个部门的数据和统计方法进行分析,综合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我们认为:目前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 1.2 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为 2 亿人。”(第 3—4 页)韩长赋在《关于农民工问题调研后的几点思考》中也指出:“2004 年,按出乡务工 3 个月以上口径统计,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为 1.18 亿人,在乡镇企业就业人员 1.36 亿人,剔除其中重复计算部分(有些外出务工农民到异地乡镇企业就业),估计非农产业的农民工人数大概在 2 亿人以上。”(同上,第 63 页)由此可见,本书正文中的“9400 万农民工进城务工”数字就目前而言,仍然肯定是偏保守的。

另据新华网北京 2006 年 11 月 22 日电(记者刘兵、董峻):据农业部调查监测,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初步预测到今年底,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人数将达 1.149 亿,比去年增加 670 万人。

力需求的制约,只能跻身于那些工资低廉、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的次级劳动力市场(secondary labor market)。于是,在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上找工作的农民工愈多,他们所能获得的工资便愈低;而农民工为了满足最低必需支出,不得不提供更多的劳动甚至让原本不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未成年工和家庭其他辅助劳动力也加入寻找工作的行列,进一步形成工资的向下压力。劳动供给与工资之间的这种状况,可以理解为两者之间的一种正反馈关系,使得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竞相逐底(race to the bottom,意指打压到底线的竞争)。这个底线,就是农民工的保留工资^①。简而言之,现阶段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工资竞相逐底,亦即农民工工资竞相逐低直至锁定于农民工的保留工资。这种现象,笔者称之为中国农民工的低工资现象。

或许有人会指出,在经典的向右上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与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相交的情况下,只要需求曲线不变而供给曲线右移,或者虽然这两条曲线都向右移动但供给曲线右移的程度要大于需求曲线,均衡工资(率)就会下降,因而,在既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典劳动供求分析框架内已经能够解释工人工资下降的问题。的确,如果供给增加的程度大于需求增加的程度,均衡工资当然就会下降,但是,经典的劳动供求分析只能解释工资的下降,却难以解释工资不仅仅下降而且总是趋向并锁定于保留工资的现象。在向右上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中,随着工资(率)的下降,劳动者的劳动供给也逐渐减少;当均衡工资(率)下降到保留工资

^① 保留工资(率)[reservation wage (rate)]是指劳动者愿意接受某一工作的最低工资(率)。